

二十世紀名人紀實叢書

軍旅崢嶸人物

策 划 空 堂

主 编 康 捷 魏 兵 柳 霜

軍旅 崢嶸

太 白

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名人纪实丛书

策划 空堂

主编 康捷 魏兵 柳霜

军旅峥嵘人物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名人纪实丛书

策 划 空 堂

总集编 康 捷

主 编 康 捷 魏 兵 柳 霜

副主编 李锦峰 杨 波 吕允丽 刘 路

郭兴文 李向晨

编 委 齐相潼 范新坤 杨 勇 李亚新

庞 烜 陈 青 田和平 陈 凡

胡良骅 李晓林 邵之茜 尚志明

荆三隆 徐艺源 于希民 刘应安

陈克勤 牛 恺 金 平 王新民

欧阳妙玉

目 录

刘邓策动高树勋起义始末	彭荆风	(1)
聂荣臻不想当市长	奚启新 李培才	(46)
谭震林的脾气	董保存	(70)
邓华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序幕	罗印文	(87)
朝鲜战场上的中国空军	潘荣琨	(98)
最后一任志愿军司令员	马晓春	(154)
1958 年炮轰金门总指挥	潘荣琨	(183)
中国军人入越参战抗美秘闻	王贤根	(211)
对印自卫反击战纪实	李晓建	(243)
乌苏里江畔的枪声	万 一	(321)
冲破海峡封锁	王守锦	(340)
中国反恐怖部队龙虎榜	东 辉	(395)
✓ 迎接挑战：中国将领如是说	中 夙	(411)
✓ 李宗仁与台儿庄之战	曾凡华	(517)
我便是我——冯玉祥	贾绣君 张文玲	(594)
张自忠：做一个榜样给人看	贾绣君 张文玲	(645)
我得坐着死——吉鸿昌	贾绣君 张文玲	(671)
傅作义甩掉了蒋介石	贾绣君 张文玲	(694)

刘邓策动高树勋起义始末

●彭荆风

1945年10月末，北中国的平汉路上战云密布，邯郸、安阳、磁县一带，国共两党的军队频繁调动，城市、村庄里驻满了军队，到处挖的是战壕，特别是邯郸这古战场上，双方的军队正严峻对峙，一场大战即将爆发。行人商旅惧怕战祸，早已绕行他处。

这天晚上，风冷夜寒，在磁县马头镇附近，有个身材壮实、布衣长袍的中年人由两个颇为精悍的年轻人陪同，越过火光闪烁、鹿砦密布的两军封锁线，在冷洁如霜的月光下匆匆疾行。

这个人，自1936年起就担任刘伯承的参谋长，抗日战争后期曾任太行军区司令员，解放后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参谋总长、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他就是李达将军。

这时候，平汉路大战的序幕已经撕开，东线的国民党军四

十军一〇六师、三十九师正在与共产党晋冀鲁豫军区杨得志指挥的第一纵队、陈再道指挥的第二纵队作战。作为军区参谋长的李达，在这军情紧急的时刻，怎么不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身边赞助军机，而要离开部队微服夜行？

李达将军今夜穿越火线，是去执行一项秘密使命。

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人民在胜利的喜悦中才度过了短暂的一周，内战的枪声就在中国的东南西北响起了。

国共两党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合作抗日。就是在这8年中，也是磨擦不断（最令人惊骇的当然是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如今日本投降了，这大片敌占区土地由谁来掌管？又使国共两党产生了剧烈的争执！

在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从延安飞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同时，国民党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属下的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正率领约5个师兵力向山西上党地区的临汾、浮山、冀山开进，直指已被共产党晋冀鲁豫军区包围的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原来由日军占领的城市，和已解放的襄垣、潞城等县，另一支部队则由国民党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指挥，第二十三军、八十三军共6个师随后接应……

世界上的人们只注意到了国共两位领袖在谈判桌前的活动，却没想到一场大战已于1945年9月10日在这晋东南古战场上惨烈展开。

毛泽东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了40天，这古上党郡也打了40天。谈判结果是国共两党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一项《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著名的《双十停战协定》），打的结果是上党地区为共产党军队所解放，国民党阎锡山系统的

11个师及一个挺进纵队共35000余人被消灭，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于10月6日被击毙，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于10月12日被俘……

国内外热望和平的进步人士，当时得知这一战讯后都松了口气，以为政治上有《双十协定》保证，军事上国民党又遭沉重一击，全面的内战总可暂停吧！

他们哪里知道这上党之战只是后来持续3年的解放战争的序幕。国共两党都是有军队的大党，政治争执的延续必然上升为军事行动，战火也就越燃越旺。

毛泽东早就看到了平汉路必将有大战，他在1945年10月12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电报，就指出：“山东、华中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须1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须2月至3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还特别叮嘱：“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60000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其一部至大部。”

不出毛泽东所料，两天后（1945年10月14日），国民党派出14个军沿平汉线开往华北，其中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指挥的马法五第四十军、鲁崇义第三十军、高树勋新编第八军，以及唐家良三十二军、伪军孙殿英等，共约45000人为第一梯队沿平汉路北上，还有谢辅三的二十七军、张跃明的三十八军、吴绍周的八十五军随后跟进，准备与第一战区罗历戎的第三军、李正先的第十六军在石家庄会合，然后再继续北进，与已经空运到北平的侯镜如第九十二军、牟庭芳的第九十四军会师，用以巩固华北控制平汉路这南北大动脉。

1945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赓的电报中指出：“因上党与阎顽（按：指阎锡山）作战（这是必要的），胡顽（按：指胡宗南）之十六军得以顺利通过，第三军亦在积极北进途中。如该两军均能到达石家庄集中，即将力图南北打通平汉路（高邑、汤阴段）配合空运、海运进入平津，我向东北、冀热辽转移兵力，将受到严重威胁。”

毛泽东这一分析是准确的，如果蒋介石集团的这一战略企图得逞，不仅将从南边威胁太行军区，还可以在北边增强国民党对东北军事发展的力量。刘伯承司令员在上党战役前讲解这严峻局势时，曾说：“蒋介石的军队沿4条铁路开进，4个爪子伸向我们扑来了。人家的足球向我们华北解放区踢过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我东北解放军作战略展开……”

上党战役还没有完全结束，刘伯承、邓小平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匆匆东向，部署平汉战役。

从刘伯承、邓小平的两头兼顾，也可见战局紧张。

这时的刘、邓所属部队，刚打过一场硬仗，也不能休整，就星夜调头向平汉路开拔。正如邓小平后来回忆那样：“我们比上党战役时还困难，好处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集合起来的整体。打了上党战役，疲惫不堪，我又回过头去打邯郸……”

而国民党沿平汉路北犯的十一战区3个军（三十军、四十军、新八军）都是原西北军的底子，按李达参谋长的评价是：“比较有战斗力，军官较有军事素养和战斗经验，统驭力强；士兵久经训练，在编制装备上火力重于突击。三十军是半机械化部队。”

用一支刚集合起来的游击队，去打敌人训练有素的野战部队，这对统帅和战士都是严峻的考验。

刘、邓根据形势的需要，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把所属冀鲁豫军区、冀南军区、太行军区、太岳军区的主力部队，分别改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二、三、四纵队。除了陈赓、谢富治的第四纵队在同蒲路作战外，杨得志司令员、苏振华政委的一纵，陈再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的二纵，陈锡联司令员、彭涛政委的三纵都先后回师平汉线。再加上冀鲁豫军区、冀南军区、太行军区杨勇、杜义德、王宏坤、秦基伟、韦杰、孔庆德等指挥的部队，共 60000 余人，还有 100000 民兵参战。

刘伯承司令员是起自四川的将领，他不仅韬略过人，还饱读诗书，极熟悉成都武侯祠前那副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他在和政治委员邓小平调兵遣将，筹划对北上的国民党军打击的同时，还在思考怎么分化瓦解敌军。

由于各种因素，他们的视点落在了当时担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的身上。

高树勋是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旧部，他行伍出身，1915 年起在冯玉祥手下当兵，因为枪法精良，曾经作为冯玉祥的贴身侍卫，保护冯玉祥在汉口与北洋军阀首领、内阁总理段祺瑞谈判；1919 年升为排长，以他的干练在不到 9 年的时间擢升为师长，成为西北军系统的战将之一；1930 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高树勋师在位于陇海、津浦铁路的三角地带亳县，与其他师一起把蒋军打得大败，歼敌 25000 余（毙敌 5000、伤敌 20000），逼得蒋介石的指挥部仓惶南移；冯玉祥失败后，他的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

第二十七师，由孙连仲带领，于1931年参加过蒋介石集团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二、三次围剿；1933年又追随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担任过第二挺进军司令。他一生戎马，颇多坎坷，既反蒋也反共又抗日，是个性格、经历都极复杂的旧军人，因为是杂牌军，虽然位居中将，却长期受蒋介石嫡系的歧视和排挤，扣粮扣饷扣军火。对他这个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连个正式番号也不给，只是个“新编第八军”。

军人的个性比士大夫那“士为知己者用”还强烈，以诚相待，他愿为之赴汤蹈火，略有不恭就会怒而干戈相向。

最使高树勋气忿的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嫡系部队都快速地空运、海运、陆运，前往东南沿海以及东北、华北等战略要地接受地盘物资，对本来就处于敌后的“新编第八军”，却来个与共产党一样待遇，严令“原地待命”，不准前往敌占区受降。

气得高树勋拍桌子摔茶杯大骂：什么原地待命？老子八年抗战为的是什么？徐州会战为什么不让我原地待命？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一怒之下，既不顾蒋介石的军命，也不管后果，以北上收复失地为名，率领部队从驻地南召出发，以急行军速度经过叶县、襄城、禹县，开往郑州近郊，抢在国民党嫡系部队之前，从日本侵略者手里接收了新郑县城。

在重庆的蒋介石得知高树勋擅自移动部队，气得大骂。急电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从西安飞往郑州处置。

胡宗南下了飞机一看，高树勋已陈兵郑州郊外，稍有不慎就可能激起兵变。

蒋介石只好按下怒气，另图对策。他主意一变，不仅没有追查高树勋违抗军令的事，反而对高树勋加官晋级，升任为十

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在9月5日电令高部：“由广武方面渡河，向汲县挺进，扫荡奸伪，监视日军。”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也是西北军将领，当时已受领任务从河南新乡北上打通平汉线，与石家庄的第一战区两个军会合。蒋介石这样做实际上是把高树勋的部队调离郑州送上内战最前线。

高树勋盛怒之下干了那违抗军令抢占新郑的事，也有些后怕，整日惴惴不安。他当然明白这“副司令长官”是个有职无权的虚衔，蒋介石要叫他离开这中原古城去内战前线，蒋介石惯于借刀杀人。他在敌后多年，看够了国共两党闹磨擦的后果，朱怀冰、石友三等人哪个不是一败涂地。处于这国共两党相斗的夹缝中，自己怎么生存呢？

蒋介石一向只相信他手下的“黄马褂”（黄埔系学生和教官），黄埔系中最亲近的是浙江军人，浙江军人中又以奉化籍最得宠。由原来的西北军、东北军、桂系、川军、滇军改编的部队都是蒋介石眼中的沙子，必欲除之而后快，不久前在昆明兵围五华山，夺去龙云兵权就是一个令人心寒的例子。

正当高树勋处于惶恐、苦恼中时，幸运之星已在他周围闪烁。多年来，西北军中已隐藏了一批共产党员做“军运”工作，当时，作为高树勋座上客的王定南，是1930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1931年就奉北方局之命，进入西北军爱国将领吉鸿昌部做“军运”工作，1935年担任过中共河南省工委书记，1938年担任过北平特委书记；高树勋的主力团长（暂编二十九师第一团）田树青，曾在1931年加入过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由于参加抗日同盟军失败，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另一名高级军官聂志超，1925年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时加入共产党，1928年领导过山

东阳谷“坡里暴动”，失败后遭到追捕，远逃外地而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不得不化名隐藏在西北军中；这些人可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追求进步倾向革命的思想，从来没有停歇。

王定南曾在1944年5月在河南郑县、宝丰等地组织“河南人民自卫军”，那里是国民党控制严密的地方，8月间这支“自卫军”被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部派兵镇压，王定南、唐宏强夫妇以共产党嫌疑被逮捕。在押往汉中国民党第一战区军法分监部的途中，路过驻扎镇平的高树勋部。高树勋正想接近共产党人，借审问为名，和王定南作了一次特殊的长谈，他佩服王定南的真知灼见。几个月后，在高树勋的努力下，说服了也是西北军旧部的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把王定南保释出狱。王定南深感高树勋不同于一般国民党军人，也就大胆地在1945年5月来到已移驻河南内乡马山口的高树勋部“作客”。

这时候，国际形势已明显对同盟国有利，欧洲战场纳粹德国、意大利已战败，所谓“轴心国”只剩下一个日本，在南太平洋战区也是败仗不断；一旦抗日胜利，中国政局将如何？这是高树勋最关心的，常常就教于王定南，每次谈话后，他都深受启示，也就更尊敬王定南，把他列为知己。

保存实力，不为蒋介石集团卖命，这是高树勋多年来的一条老主意，但是怎样运用得巧妙，不被抓住把柄，这却很难！

1945年5月底，八路军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将军，从豫西挺进鲁山、南召，准备依托险峻的伏牛山区开辟新的根据地，以达到共产党中央“开辟河南，控制中原要地”的战略指示。

堵击王树声部的电令一封接一封发往西安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胡宗南又转令高树勋进驻南召、嵩县布防。

一场大战就要在伏牛山区展开了！

作为八路军前锋的是河南军区第三支队司令员陈先瑞（60年代曾担任北京军区政委）。6月间他们先后攻占鲁山以西瀼河、上汤等大部地区，并扫清了南召外围据点，逼近南召城下。

高树勋深知八路军锋锐难当，忙请王定南前往联络，要求和八路军指挥员在火线上谈判。

河南军区允诺高树勋所请，派陈先瑞司令员到南召马市坪的一块河滩上见面。

仲夏6月，伏牛山地区已骄阳炙人。高树勋卸去戎装，一身白绸衣裤，戴了副墨镜，由4个随从，一班警卫保护前来赴会。

双方都很坦率。

高树勋慷慨陈词，表示自己是个有良心有民族感的军人，不会当汉奸卖国贼。直接了当请求八路军体谅他的苦衷，不要攻占南召。他说：“你们占领南召，我就没有地方活动，对上也不好交待。”

陈先瑞答允了高树勋的请求，当场达成双方立即停火，划定地区活动，互不侵犯，互通情报等协定。

这两个多小时的谈话，高树勋深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通情达理，不以势压人。对在这次谈判出了力的王定南也更加敬重。

胡宗南虽然无法了解这次谈判的内情，但从高树勋与八路军和睦相处的表象来看，使他疑心这支杂牌军有联共之嫌，忙电令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指挥的第九十军，迅速由卢氏县移往嵩县，密切监视高树勋的活动，并伺机解决这支部队。

嵩县离南召不过百余公里，车行只要几小时，李文是胡宗

南部队精锐之一，高树勋的新八军当然不是他的对手。

卧榻之侧有这么一群虎狼，高树勋哪能安然起坐？使他常处于惶惑不安中，他只好再求计于王定南；眼看日本要打败了，蒋介石也就能抽出手来收拾我们了。我该怎么办？

王定南知道高树勋既怕蒋介石又恨蒋介石，就说：应该及早提防。

高树勋深知靠西北军同僚那几支残破军队是抵挡不住蒋介石的强大压力，只有靠共产党的支持，才能在夹缝中生存。

而这时，陈先瑞的部队已南下较远，要找共产党只有进入太行山。

王定南乐意从命。于是高树勋在1945年8月1日用白绸子写了一封信，请王定南深入太行山腹地，送给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希望能给予支持。

高树勋这时候想起彭德怀，是他们之间还有过一段来往。“抗日同盟军”失败后，高树勋曾从1937年7月起担任河北省保安处副处长，彭德怀将军曾受党中央的委托，专程去到保定会见高树勋，向他转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观点，使既倾向抗日又深为前途忧虑的高树勋很受启发。彭德怀平易诚挚的作风，也使他印象深刻，长久难忘。如今处境困难，他也就想起了这位共产党的老朋友。

他郑重嘱咐王定南，“定南兄，书不尽意，一切都拜托你了。”

高树勋不知道彭德怀早已回到延安，多年来坐镇太行山指挥抗日战争的是刘伯承、邓小平。这时候刘、邓也不在太行山，他们和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的一大批高级将领如陈毅、贺龙、林彪、薄一波、陈赓、滕代远、张际春、陈再道、邓华、陈锡联……自1942年春天起就先后被集中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

1945年5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太行山的军事政治事务主要是由太行军区司令员李达将军负责。“八·一五”日本投降，这对云集延安的中共中央高层领导人来说，既在意料中又感到突然，他们虽然预料德国法西斯集团完蛋后，日本难以在远东久撑，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

8月初苏联在东北参战，日本关东军土崩瓦解。毛泽东曾在8月1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的电文，指出：“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虽然及时提醒了全党应付新的局面，事实上，这变化来得太快，以致那各战略区的主要统兵将领8月24日还滞留在延安。这时候，太行山也很吃紧，李达将军面对国民党四路大军扑过来的严重态势，一面亲赴上党前线部署作战，同时急电在延安的刘伯承、邓小平：“组织大军与指挥强大野战军，急需主要干部，请带陈锡联等同志乘机回太行。”

乘机，就是乘飞机。

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只是延安有座简陋的机场。刘伯承、邓小平1944年从太行山赴延安时，都是爬山越岭晓行夜宿，穿越敌人封锁线，辗转多日才到达延安，如今，太行山怎么会出现一座可以降落飞机的场地呢？

这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機會造成的。

1944年夏秋。美国驻中国空军开始使用了B——29式重型轰炸机，从四川成都、湖南芷江等地起飞，轰炸日本本土和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华北，以及东南亚等军事设施；这种被称为“超级空中堡垒”的飞机，体长99英尺，高约28英尺，翼展141英尺，能以350英里的时速在38000英尺高空携带4吨炸弹连续飞行3500英里，是当时航程最远、威力最大的一种轰

炸机；当第一枚炸弹击中日本九州岛的八幡制铁所时，曾使日本岛国上下陷入极度恐慌中，使他们终于明白，战火已往相反方向燃烧，日本本土也将成为战地了。

这年秋天有一架 B—29 飞机，在执行任务返回基地时，被日军地面炮火击伤坠落于山西平顺县的一个山沟里，11 名美国飞行员仓皇跳伞降落，他们很幸运，没有落入敌人手里，而是被八路军和民兵救起送往涉县赤岸村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部，并受到了李达将军的热情接待。

这些美国飞行员劫后逢生，心情很是愉快，不断的划十字，感谢上帝也感谢共产党根据地的朴实军民。他们在乘马去师部的途中，放眼浏览这北方农村和山野的景色，秋天花果熟了，红、绿、兰、紫特别鲜艳，涉县赤岸村以西 30 华里的长凝附近有一大片平坦开阔的土地，他们误以为是八路军修建的飞机场，却用遗憾的语气对护送的人说：“不知道你们这里还有一座秘密飞机场。要是事先知道，我们的飞机就可以在这里迫降，不致出事了。”

翻译向这些美国飞行员解释：“那里并不是飞机场，而是一片天然的开阔地。”

是吗？美国人还不相信，他们纵马走近前仔细看了看，才笃信八路军不打诳语。

性格开朗的美国人绝处逢生，又遇见这么友好的招待，他们在啃着肥鸡喝着当地人酿制的山西风味烧酒时，也就热情地建议把那块开阔地稍加修建，使之成为一座简易机场。

李达将军是个细心而有远见的人，他原来也有这种想法，只是八路军没有飞机，而把这事搁下，如今受到这些美国飞行员的鼓动，就迅速组织部队和附近的群众，修筑了这座简易机场。

美国观察组由重庆飞往延安时，还常把这里作为一个中转站。

如今，却便利了刘伯承、邓小平等将领从延安返回太行山，不必旷日废时的爬山越岭远程跋涉了。

在军情紧急的时刻，即使是缩短几分钟，也大大有利于夺取胜券，何况这时候两面受敌的太行山急需刘伯承、邓小平以及他手下的那批战将回来统率军队；这个简易飞机场可是帮了大忙！

1945年8月20日夜，一架属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美制道格拉斯运货机从延安起飞了。

与平日不同的是这天有一批八路军军人来搭乘飞机。

这次飞行非同寻常，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高级将领都被装进了这架陈旧简陋窄小的运货机内；人进到舱内连腰也伸不直，飞机门也关不严，螺旋桨发动时还要靠人推动。

陆续进入飞机内的有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薄一波、陈赓、肖劲光、傅秋涛、李天佑、邓华、杨得志、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这些人，当时都是各个敌后根据地的主帅和战将。大战在即，归心似箭。

碧眼黄发的美国飞行员只略感奇怪，今天乘飞机的人怎么这么多？却不知道这些身着布军装朴实得如乡巴佬的人，都是些叱咤风云的将帅。

从当时美国 and 国民党集团的亲近关系来看，如果飞行员发现了这“秘密”，将会持什么态度？会不会制造一个空难事故？不过这么多将帅同乘一架破旧的飞机确实过于冒险，但是，国民党已在空运、海运、车运部队赶往各个战略要点，军情紧急，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当时负责和延安美军观察组联络的黄华到机场一看，见飞